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45:2 (2015), 45-68

## 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關鍵詞:** 階級、社會不平等、社會流動、階級意識、臺灣

**JEL 分類代號:** I30

---

\* 聯繫作者: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臺北市 115 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電話: (02) 2652-5107; 傳真: (02) 2652-5050; E-mail: zoo42@gate.sinica.edu.tw。

## 摘 要

本文回顧近二十年來臺灣階級不平等與階級流動的趨勢。研究顯示造成臺灣各階級所得不平等惡化的因素有二，其一是產業升級造成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薪資所得不平等上升；其二是全球化下兩岸經貿擴張，獲益者集中在少數資方與技術管理高層，對財產所有者減稅更導致所得分配惡化。階級不平等惡化造成階級流動的停滯，包括創業機會減少與教育階級複製。因此，多項指標顯示臺灣民眾主觀上開始覺得自己的階級地位向下流動、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據此，反服貿運動確實反映部分民眾對全球化造成階級不平等惡化的不滿。

## 1. 前言: 對不平等的焦慮

2014年3月, 臺灣爆發太陽花學運, 學生佔領立法院議場 24 天, 獲得民衆與社會各界支持, 運動雖和平退場, 至今仍餘波盪漾。兩岸經貿往來, 刺激臺灣民衆對貧富差距惡化的焦慮 (林宗弘與胡克威, 2011), 可能是導致學運與其背後民意基礎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 臺灣的反服貿運動絕非特殊個案。

在全球金融海嘯與貧富差距的影響下, 從 2011 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開始, 各種反全球化運動風起雲湧 (Graeber, 2013)。最近, 法國經濟學者 Thomas Piketty 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Piketty, 2014) 分析先進工業國家貧富差距惡化趨勢, 主要因素是財產所得者獲益率遠高於經濟成長率, 引發歐美學術界與媒體爭論, 同樣顯示歐美學界與民衆對經濟分配不平等的焦慮。

近年來, 臺灣面對本土產業轉型與對外貿易擴張, 尤其是對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依賴程度加深, 上述因素與臺灣本地的貧富差距或階級流動是否相關? 臺灣各階級之間貧富差距擴大, 將導致何種政治態度與社會後果? 本文將從社會學的階級分析介紹開始, 回應上述問題, 也歡迎本刊的經濟學讀者不吝指正。

## 2. 階級不平等: 理論回顧與臺灣現實

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 社會不平等的起源與後果是社會學的核心議題。社會學家從人口、膚色、性別等多種重要的社會分化因素來切入社會不平等的起源, 階級或階層只是其中之一。什麼是階級? (Wright, 1997) 相對於性別或膚色等生理特徵, 社會學中的階級或階層, 指的是與經濟生產活動有關的社會不平等, 然而, 學界對如何分析階級爭論不休 (Crompton, 1998)。綜合各社會學派觀點, 階級源自於某些生產工具的財產權, 這些生產工具包括資本 (廣義包括房地產、金融投資或財富)、技術 (廣義包括正式教育或證照、年資

與非正式的工作經驗等)、科層組織的管理權威等,這些財產權使得擁有上述生產工具或管理權威的一方,成為擁有所得分配與社會流動優勢的特權階級 (Wright, 2005; Sorensen, 2000; Grusky and Galescu, 2005)。

本文稱呼臺灣民衆的客觀階級位置時,主要採著名學者 Wright (1997) 的簡化版四階級分類法:資本家(擁有資本且雇用他人)、自營作業者(擁有資本或土地但未雇用他人,經常被稱為小資產階級或舊中產階級)、專業管理人員(不擁有資本,但擁有技術或管理權威的受雇者,又被稱為新中產階級)與非技術工人(不擁有資本、無技術證照且不管理他人的受雇者,有時被稱為無產階級)來進行討論。

所謂階級不平等,就是上述各個客觀階級位置所得分配的不平等,這種分配不平等體現在利潤與薪資所得等主要收入分配上,而且可能會擴散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例如醫療社會學者發現不同階級或階層的人,其飲食、抽菸與喝酒的習慣不同(例如美國人的體重差異),導致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個人慢性疾病罹患率與壽命長短,不同階級的所得差異也會影響人的主觀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乃至於離婚率、自殺率與犯罪率等等 (Lareau and Conley, 2008)。

從各國歷史數據來看,有很多因素會影響階級不平等的擴張或減少。造成這種改變的因素包括戰爭、革命、災難與民主轉型等,也包括本文後面討論的經貿全球化、國家財政與社會福利政策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 Huber and Stephens, 2001; Silver, 2003)。如 Piketty (2014) 等學者所發現的,戰後三十年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的特殊時期,受到經濟大恐慌與世界大戰摧殘、在工會及福利國家崛起影響下,先進工業國家裡財富擁有者的政治實力與經濟分配優勢一度大幅下降。然而到了最近三十年,所謂新自由主義思想與經貿全球化政策的影響下,歐美國家減稅、將許多政府經營或干預的經濟活動民營化或去除管制,加上製造業外移到中國、印度與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先進國家出現財政赤字(有些國家包括貿易赤字)、失業率居高不下、福利政策縮水、工會實力衰退,導致國內貧富差距惡化 (Babb, 2005; Esping-Andersen, 1999; Milanovic, 2005)。

過去三十年間，臺灣的階級結構與所得分配有什麼變化？臺灣主計總處將就業人口分五類：(1) 雇主：從 1981 年到 2011 年間，雇主佔就業者的比例先上升後下降，大約維持在 4.5%，顯示階級流動趨緩；(2) 同一期間，臺灣的自營作業者（包括農民）所佔的比例由 21% 下降到 12.4%；(3) 無酬家屬勞動者佔就業者的比例，自 1981 年起，由 10.4% 持續下降到 2011 年的 5.4%；(4) 私營受僱者佔全體就業者比例持續上升，由 1981 年不足 52% 到 2011 年超過了 68%。最後，(5) 政府受僱者佔所有就業者比例輕微下滑，從 12.4% 減少到 9.7%。同時，臺灣的貧富差距指標——例如前五分之一家庭所得與後五分之一家庭所得的比例，也從 4.2 倍提高到 6.2 倍。這些趨勢顯示受僱者比例增加與貧富差距惡化。然而，上述官方數據無法區分同為私營受僱者的專業管理人員（新中產階級）與非技術工人。筆者的研究發現，臺灣受僱者當中專業管理人員比例仍在上升，例如大學以上勞動力上升到近三成，而服務業勞動力則提高到近六成，中間三等分位家庭（20–80%）所得比例也沒有明顯下降（林宗弘，2013，頁 699）。

臺灣階級不平等發展的趨勢為何？臺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約落後歐美、日本等先進工業國家十餘年，正處在後工業化的新中產階級擴張、與全球化導致貧富差距惡化的兩股趨勢之間（林宗弘，2012）。導致階級結構轉型的第一股動力是內生性的產業升級，導致專業管理人員增加並且薪資提升，以及薪資不平等的擴大（林宗弘，2009）；另一股動力是全球經貿開放，特別是對中國大陸的資本外移與貿易擴張，導致資方與管理階層獲益增加。此外，自僱者與無酬家屬勞動者佔就業人口比例下滑，造成這種趨勢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勞力密集中小企業大量前往中國投資，以及本土資本集中化，使家庭工廠或自營店鋪減少（林宗弘，2014）。另一方面，出口數據顯示，1985 年中小企業佔出口產值的 76%，對中國大陸出口不到一成；但到 2005 年時，中小企業的出口產值所佔比例只剩下 18%，大型企業集團的出口產值比例卻達到 82%（王振寰，2010），近四成出口到中國大陸進行勞力密集的代工，最終產品再銷售到歐美市場。在臺灣所得墊底的非技術工人，則面臨產業外移後的失業與貧窮問題——經常上街抗爭的關廠工人就是明顯的例子。因此，雖然中間三等分的



所得比例並沒有下降，前五分之一高所得組與後五分之一低所得組的平均所得差距卻大幅上升，前 5% 除後 5% 的所得比例更逼近百倍 (朱敬一與康廷嶽, 2015)，社會流動也由經濟成長時的階級向上流動，逐漸轉為停滯為主 (蘇國賢, 2008)、甚至向下流動比例增加。總之，臺灣的新中產階級並未落入所謂的 M 型社會，但雇主與少數專業管理人員獲益、與底層非技術工人就業處境的惡化，仍造成階級分化的後果 (林宗弘, 2009)。

本文是從階級分化來看臺灣所得差距惡化的評述，主要回顧臺灣社會學界過去的研究成果，部分數據來自筆者最近進行的幾項研究，例如在 2013 年 12 月到 2014 年 4 月間，筆者與助理收集並整理合併兩個臺灣現存的企業數據庫——天下雜誌一千大企業排行榜數據 (2000–2012, 逐年增加為兩千大),<sup>1</sup> 與中華徵信所的臺灣五千大企業排行榜數據 (1996–2012),<sup>2</sup> 暫稱為中央研究院《臺灣企業排名資料庫 (第一版)》，是本文所使用的企業相關數據來源。如表 1 所示，由於 2006 年起天下雜誌才加入兩岸三地排名、<sup>3</sup> 而且臺灣的財報會計規範改變，我們僅使用 2006–2012 年的數據，其中變量包括年度營業額、獲利率、稅後純益、負債比率、海內外總員工數、是否為上市公司等。從個別變量的缺損比例來看，營業額與員工數的數據較完整、獲利率與稅後純益的資料較不完整。隨後分析所使用的是追蹤資料常用的隨機效應模型與固定效應模型。此外，本文部分數據來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1) 的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以及中國效應調查 (張茂桂, 2011)，另外還有大量官方資料來源，以圖表註的方式請讀者參考。

### 3. 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

臺灣所得分配的階級不平等來自兩個可能的因素——內生性的產業升級 (林

---

<sup>1</sup> 天下雜誌 2000 大排名, <http://www.cw.com.tw/1000/1000List.action>, 取用日期: 2013 年 12 月 21 日。

<sup>2</sup> 中華徵信所 TOP5000 企業排名資料庫, <http://www.credit.com.tw/special>, 取用日期: 2014 年 5 月 6 日。

<sup>3</sup> 天下雜誌兩岸三地 1000 大排行調查, 2007–2013,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http://new.cwk.com.tw/cgi-bin2/Libo.cgi?>, 取用日期: 2013 年 12 月 21 日。

表 1 中央研究院《臺灣企業排名資料庫 (第一版)》的敘述統計

變數	N	平均值	變異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在臺員工數	15,310	864.418	2,384.578	1.000	51,525.000
營業收入	15,623	166.034	810.240	1.000	39,053.900
海外員工數	6,576	3,830.444	29,096.490	1.000	1,283,528.000
兩岸三地排名	20,964	39.469	157.660	0.000	1,000.000
獲利率	13,683	4.444	60.142	-5,208.333	1,423.353

註: 1. 「在臺員工數」使用中華徵信所 TOP5000 企業排名資料庫數據。

2. 「營業收入」及「獲利率」單位為新臺幣億元, 使用天下雜誌 2000 大排名數據, 並以中華徵信所 TOP5000 企業排名數據予以補充。

3. 「海外員工數」為全體員工數 (即天下雜誌與中華徵信所的員工數兩者取最大值) 減中華徵信所的員工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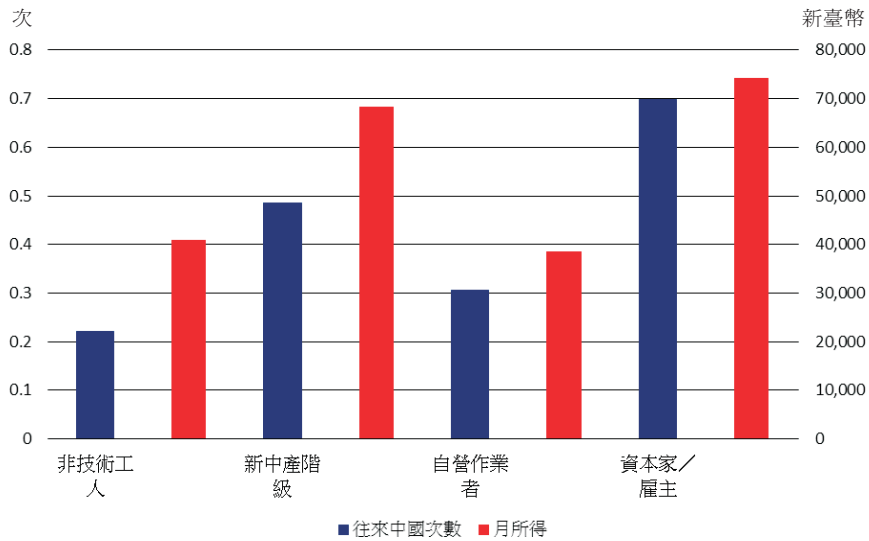
4. 觀察值「N」若無遺漏應該為 2,995 家企業 \* 7 年 = 20,965 (七個數據取得年度為 2006–2012), 表上未達此數值者即是遺漏數據。

資料來源: 天下雜誌; 中華徵信所。

宗弘, 2009)、與外生性的全球化經貿開放, 後者又以兩岸經貿開放, 對階級不平等影響較大 (林宗弘, 2012)。臺灣本土產業升級導致技術勞工與非技術勞工的薪資所得差異增加 (Atkinson, 2008) 較容易理解, 然而, 過去有經濟學家認為透過貿易開放、以外銷來推動經濟成長, 長期將會有利於減少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貧困人口與整體的貧富差距 (Rostow, 1960), 這種發展經濟學觀點影響深遠。

歷史上對貿易利益的所得分配效果之爭由來已久。以經濟起飛時期的臺灣來說, 與歐美相比, 相對豐富的要素是勞動力與土地, 因此開放貿易確實可能使大量農業人口進入工廠而脫離貧困; 然而, 當臺灣進入已開發經濟體, 貿易對象是中國大陸等開發中國家, 則我國豐富的要素變成資本與技術, 稀缺的則是勞動力與土地——回想 1980 年代末期的工資與地價上漲就是明證, 此時開放對中國大陸的貿易, 就不會發生涓滴效應 (trickle-down), 反而對有能力擴大資本與技術密集產品外銷及資本外移的大型廠商、與高技術人員或高層經理人有利 (Wood, 1994)。

林宗弘 (2012) 的研究顯示, 前往中國工作的次數與所得成正比, 亦即資本家與技術管理人員的兩岸要素流動性, 已經對臺灣的所得分配造成顯著影



註: 數據來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中國效應調查, 模型中已經控制階級、教育程度、年齡與性別等基本社會經濟背景, 前往中國每次仍能顯著提高每月所得 2,503 元。

資料來源: Lin (2015)。

圖 1 臺灣不同階級的民衆一年之內前往中國次數與所得差距, 2010–2013

響。圖 1 顯示 2010–2013 年間, 簡化的四階級分類 — 自營作業者 (含農民, 即所謂舊中產階級)、雇主、專業管理人員 (新中產階級)、非技術工人每月所得對數的線性迴歸, 在控制教育、年齡與性別等相關社會經濟變量之後, 獲得每年前往中國平均次數與月所得估計值 (以反對數還原估計), 統計結果顯示雇主與新中產階級前往中國次數顯著較多、而每次前往中國可以顯著提高每月所得 (Lin, 2015)。顯然, 雇主與新中產階級是兩岸經貿交流的受益者, 而非技術工人、自營作業者 (包括家庭企業與農民), 似乎已經成為兩岸經貿交流中的受害者 (林宗弘, 2012), 有關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簡稱 ECFA) 與這次服貿協議所引發的爭議也具有階級對立的意味。

然而, 臺商海外投資與獲益, 難道不會回饋到臺灣員工的就業與所得嗎? 爲了進一步分析臺灣企業在全球布局的衝擊, 本文這一節試圖推估廠商行爲對臺灣本地勞工失業率的影響, 而失業率向來是臺灣貧富差距擴大來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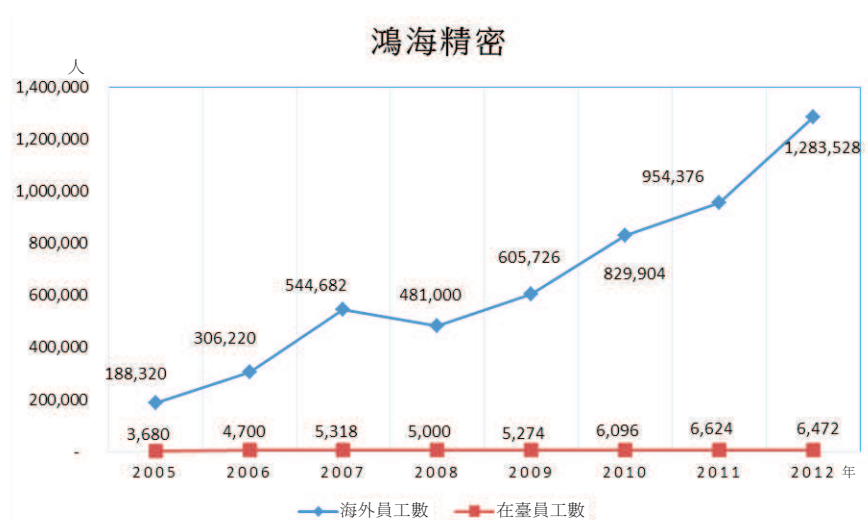


圖 2 鴻海精密之臺灣與海外員工數, 2005–2012

根據前述的中央研究院《臺灣企業排名資料庫 (第一版)》數據, 筆者抽取了三家排名前二十大的廠商 — 同時限制在所謂的高科技電子產業, 比較其歷年來海內外的雇用人數變化趨勢。這三家廠商是鴻海精密 (簡稱鴻海)、台灣積體電路 (簡稱台積電) 與光寶科技 (簡稱光寶)。圖 2 到圖 4 顯示這三家廠商臺灣雇用人數與海外雇用人數的趨勢變化。

在臺灣企業規模排行榜上連年第一的鴻海, 營業額佔了臺灣國內生產毛額 (簡稱 GDP) 的 21% 以上, 比例不輸三星、產值不亞於韓國第二名的現代集團, 如圖 2 所示其雇用人數從 2005 年約 20 萬人暴增為 2012 年底的 129 萬人, 是地球上最大的私營雇主, 然而其中臺灣人只有不到 7,000 名, 其 2010 年的資本支出為 7 億美元, 平均每位員工的相對資本支出不到 600 美元, 非常勞力密集, 2012 年的利潤率為 2.4%。台積電營業額約佔臺灣 GDP 的 4%, 如圖 3 所示, 該公司創造的主要是臺灣本土就業, 2012 年底雇用 3 萬 9 千人, 2013 年資本支出達 90 億美元, 平均每位員工約 23 萬美元, 將近三星集團的四倍, 非常資本與技術密集, 2012 年的利潤率為 31.7%。而光寶則是徹底的代工生產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EM) 產業外移案例, 如圖 4 所示, 光寶在中國大陸擴廠的同時, 臺灣的雇用人數從 3,000 人減少為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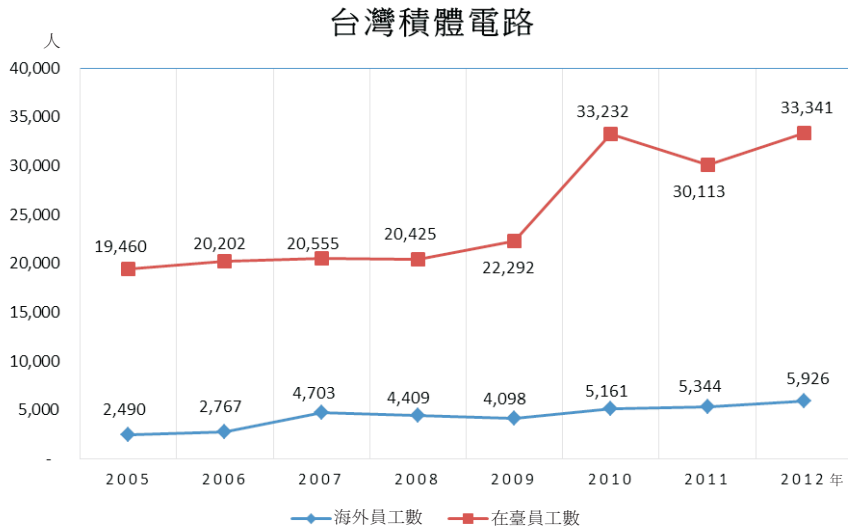


圖 3 台灣積體電路之臺灣與海外員工數, 2005–2012



圖 4 光寶科技之臺灣與海外員工數, 2005–2012

2,000 人。

簡單地說, 近年來臺灣企業海內外布局與雇用員工的決策, 可以分爲下

表 2 影響企業在臺雇用員工數的估計結果, 2006–2012

	在臺員工數 (1) 隨機效果	在臺員工數 (2) 固定效果
營業收入	1.3018*** (0.0358)	1.0863*** (0.0416)
海外員工數	-0.0315*** (0.0012)	-0.0259*** (0.0013)
兩岸三地排名	0.1019* (0.0502)	0.0445 (0.0505)
獲利率	-0.2156 (0.2663)	-0.4779 <sup>+</sup> (0.2636)
常數項	712.5513*** (42.2705)	878.7609*** (10.8090)
N	6,434	6,434
R-square (within)	0.1315	0.1319
R-square (between)	0.3346	0.3321
R-square (overall)	0.3018	0.2995

註: +, \*, \*\* 及 \*\*\* 分別表示在 10%, 5%, 1% 及 0.1% 顯著水準下為顯著的估計值。

資料來源: 詳見表 1。

列三類: 營業額大幅成長, 因而兩岸雇員都有成長, 但臺灣部分的員工數相對稀少, 鴻海是典型案例; 第二種是主要在臺灣進行產業升級並雇用本土員工為主的企業, 像是台積電與宏達電; 最後一類是產業技術未能提升、毛利率低落而選擇徹底移到海外生產的廠商, 導致在臺灣的雇員數不僅相對比例下降、就連絕對人數也下降, 典型案例有英業達或光寶等; 整體來看, 臺灣企業是哪一類型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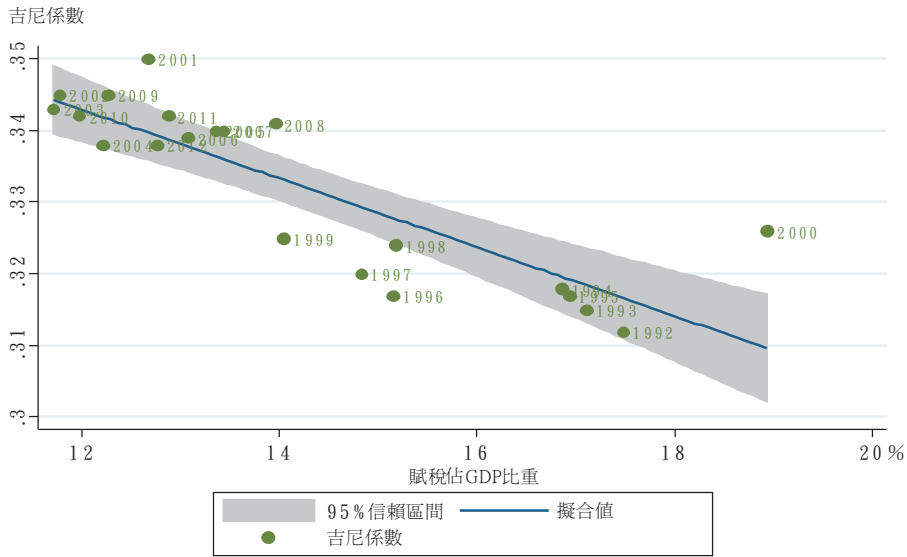
表 2 是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企業排名資料庫 (第一版)》2,995 家大型廠商在 2006 年到 2012 年間追蹤數據, 對臺灣員工人數進行迴歸估計。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 雖然企業營業額有助於提升在臺灣雇用人數, 若控制營業額之後, 廠商在海外每增加約 31 名員工, 就會減少臺灣一名員工, 雖然這個替代比率並不算太驚人, 但是具有統計顯著性, 顯示兩岸勞動力市場

上勞工替代而非互補的關係。在這 7 年間,《臺灣企業排名資料庫 (第一版)》2,995 家大型企業的平均海外員工數由 1,045 人成長到 2,335 人,在營業額等其他變量不變條件下,粗估裁減臺灣員工總數超過 12 萬名  $((1,290/31) * 2,995 = 124,631)$ 。另一個有趣的結果是:廠商毛利率與雇用人數幾乎毫無統計關聯,廠商毛利率增加時並不會提高在臺灣員工雇用人數。無論是使用隨機效果或固定效果模型,統計結果差異不大。總之,臺商赴海外投資或毛利率提升時,並未將利益或就業機會回饋給臺灣員工。

除了要素比較利益與流動能力、與企業的雇用決策之外,跨國企業內移轉訂價 (price transferring) 也造成臺灣貧富差距惡化 (Palan et al., 2010)。在「臺灣接單、中國生產、歐美買單」的三角貿易關係裡,由於中國企業稅率比臺灣稅率高,臺灣的母公司經常以中國子公司積欠的應收帳款 (服務輸出或專利等),將子公司部分營收移轉到母公司帳上,獲得避稅利益,然後將資金再投資中國子公司,並列入臺灣母公司的資本折舊沖銷。這些營收也會提高臺灣股東與高層經理人的股利與業務所得,卻與勞工的工資脫鉤,使所得不平等上升 (林宗弘, 2013)。

當全球化可能擴大臺灣各個階級之間的貧富差距時,調整貧富差距主要靠的是國家賦稅與財政支出,或者說是政府的移轉支付。近年來臺灣政府的移轉支付比例確實有溫和提升的趨勢,然而稅收佔 GDP 的比例卻在減少,兩者對調整貧富差距的貢獻相當有限。不僅如此,近年來政府大規模減稅: 減免企業所得稅、對高科技產業延長租稅假期、或是對財產擁有者減免土地增值稅、遺產稅與贈與稅,不僅沒有帶來增加本土投資與經濟成長的效果,反而疑似造成房地產泡沫,更難調整貧富差距 (朱敬一與康廷嶽, 2015)。

近年來減稅並沒有對國內資本形成或經濟成長帶來貢獻,但可能已經造成貧富差距惡化。圖 5 顯示在 1992 年到 2013 年間,臺灣賦稅佔 GDP 比重減少、與基尼係數的增長有相當顯著的關聯。減稅有利於財產所得者,這使得財產所得的集中度上升,對本土薪資或中下階層的收入則沒有幫助。根據 2009 年財政部綜合所得稅的統計數據顯示,前十分位納稅人佔全國所得總額的百分比,在薪資所得、財產交易所得、業務所得、股利所得等各類個人所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統計處；內政部統計處。

圖 5 臺灣賦稅佔 GDP 比重減少與家戶所得貧富差距 (基尼係數) 增加, 1992–2013

中分別為 30.6%、43.0%、56.8% 與 65.0% (林宗弘等, 2011, 頁 109), 顯示財產所有者、管理階層與股東的所得集中度遠遠超過薪資所得, 是臺灣貧富差距擴大的主因之一。

#### 4. 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結果

全球化影響各階級的比較利益與流動能力。由於臺灣廠商主要策略為產業外移追逐廉價勞力, 而非投資於人才訓練與產業升級 (朱敬一與康廷嶽, 2015), 加上對富人減稅導致國家財政重分配的作用喪失, 使各階級之間收入不平等擴大, 也可能會進一步影響階級流動的機會。

社會學界所謂的階級流動, 即個人在職業生涯之內、或個人與其下一代比較, 階級地位出現變化的現象, 若使用前文四個階級的簡單分類, 即是工人階級或其子女, 透過儲蓄或貸款創業變成資本家, 或透過高等教育與企業內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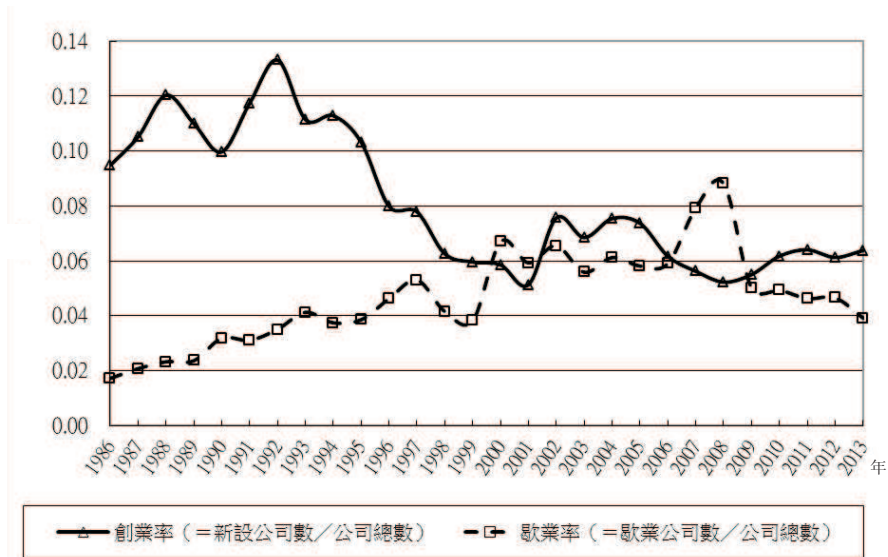


圖 6 臺灣公司的創業率與歇業率, 1986–2013

訓練升遷而成為專業技術與管理人員 (新中產階級) (Shavit and Blossfeld, 1993)。亦即, 創業與教育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兩個最重要的階級流動管道。即使階級所得分配不平等, 若是中下階級子女仍有翻身的機會, 則不會造成貧困階級複製或權貴繼承的後果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 4.1 創業機會減少與教育階級複製

近年來臺灣階級流動的情況如何? 這個問題可以透過觀察創業機會與升學機會來回答。首先, 隨著製造業產業鏈的整體外移, 下游相關產業創業機會減少, 臺灣再也不是過去所認為的「頭家之島」, 也導致舊中產階級逐漸沒落。根據經濟部的統計, 臺灣新創公司佔所有公司的比率, 或者說是企業的出生率, 從 1992 年的 13% 下降到近年來平均約 6%, 同時期倒閉公司佔所有公司的比例, 也就是企業的死亡率, 則從 3% 上升到 2008 年的 9%, 達到企業死亡率的歷史高峰, 近年來公司登記總數大約停滯在 60 萬餘間, 並未好轉 (見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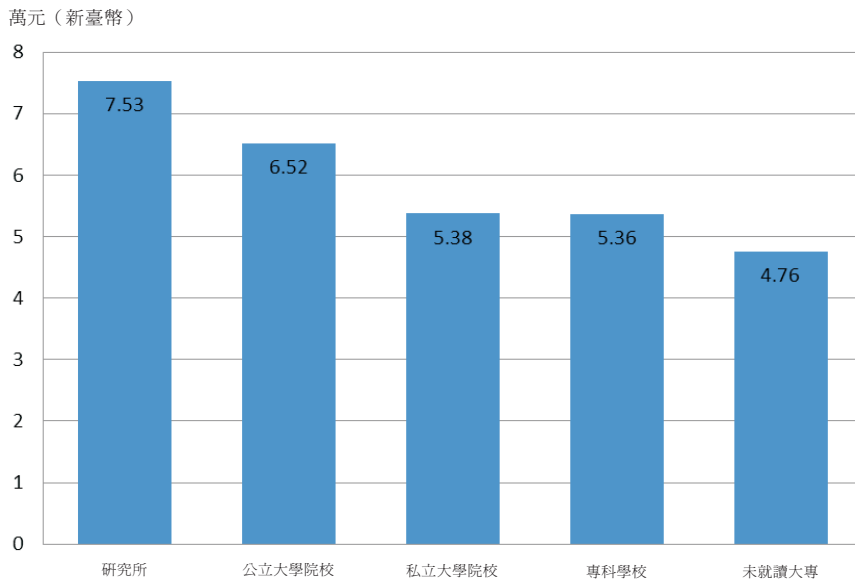
此外, 臺灣 1990 年以來新創企業資本額維持在 500 萬上下、倒閉企業資本額則是在 500 萬到 1,000 千萬之間, 顯示新創與倒閉的都是中小企業, 然

而現存公司的平均資本額, 卻從 1990 年代的 400 萬新臺幣, 提高到 2013 年的近 3,400 萬新臺幣, 也就是說, 倒閉的多半是微型企業, 存活公司資本額越來越大, 形成創業者難以越過的投資門檻。過去被臺灣人稱為「黑手變頭家」, 也就是工人自行創業變成資本家的階級流動現象 (謝國雄, 1989) 大幅減弱。雖然整體而言, 可能有許多因素共同造成臺灣創業機會減少, 但已經導致年輕世代階級不流動的後果 (統計數據請參考林宗弘, 2009)。

另一方面, 最近研究顯示高等教育擴張對階級流動影響有限。例如, 駱明慶 (2002) 發現臺大來自臺北縣市學區與明星高中, 相對屬於高社經地位家庭背景的學生居多, 張宜君與林宗弘 (2013) 則發現高階級的家庭子女仍多數進入廉價且聲譽好之公立大學、隨後進入研究所的機會較高, 而中低階級家庭子女則進入學費較高而排名較低的私立大學、進入研究所的機率也較低。大學入學率擴張這二十年來, 並沒有改善工人與農民子女進入公立學校或研究所的勝算比。不僅如此, 近年來調查顯示, 研究所畢業生或公立學校畢業生的平均月收入仍顯著高於其他學歷者, 而私立學校畢業生的平均月收入, 竟然與專科畢業學生沒有顯著差異 (見圖 7), 顯示我國高等教育擴張著重在私立專科升格為學費較高的私立大學, 卻沒有提高學生人力資本在勞動市場上的價值。

#### 4.2 主觀的階級認同與相對剝奪感

當一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擴大、創業機會減少與教育流動停滯、也就是階級不平等與階級流動雙雙惡化時, 民衆雖然可能後知後覺、卻不可能毫無知覺, 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勞工運動學者所預期的, 當客觀的社會不平等擴大時, 應該會導致民衆主觀的階級意識提升、相對剝奪感也跟著惡化 (Jackman and Jackman, 1983; Kelley and Evans, 1995), 儘管這些理論略顯粗糙, 還有些中介機制需要補充, 卻仍是社會學者研究時的基本假設。以下中央研究院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柱狀圖摘錄自林宗弘 (2013) 的研究, 顯示臺灣民衆感覺自己的階級地位在向下流動、對所得分配惡化也越來越焦慮。



資料來源：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階層組問卷 (1997 年至 2012 年) (張宜君與林宗弘, 2013)。

圖 7 1997–2012 年間各種大專類型畢業者的平均月收入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問卷每年都有主觀階級認知的相關問題，然而各年度答項的測量方式並不一致，其中以六種主觀分類最常見，其答項翻譯自美國綜合社會調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要求受訪者在：上層階級、中上階級、中層階級、中下階級、工人階級與下層階級這六類當中，選一個自己認為的階級位置。圖 8 顯示 1991 年到 2001 年間，自認為屬於「中層階級」者約佔 40–45% 之間，然而從 2001 年以來，臺灣民眾對自己階級地位的認知下滑，自認是中層階級者下降到 2009 年的 27%、中上階級比例也下滑；認為自己是「中下階級」者由 1997 年的 14% 上升到 2009 年約 20%，自認為是「工人階級」的反倒從 2001 年 15% 的谷底，上升到 2009 年的 37%，達到歷史高峰。

圖 9 詢問的是受訪者覺得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嚴不嚴重，單選答項分成四類 — 非常嚴重、嚴重、不嚴重與非常不嚴重。1997 年以來每兩年一次的回答百分比顯示，2001 年以前與之後發展趨勢十分不同，之前回答非常嚴重與嚴重者各佔四成上下並互有消長，回答不嚴重者持續增加到三成以上，顯見當時民眾對貧富差距改善較為樂觀；從 2003 年起趨勢逆轉，回答貧富差距非常

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 (林宗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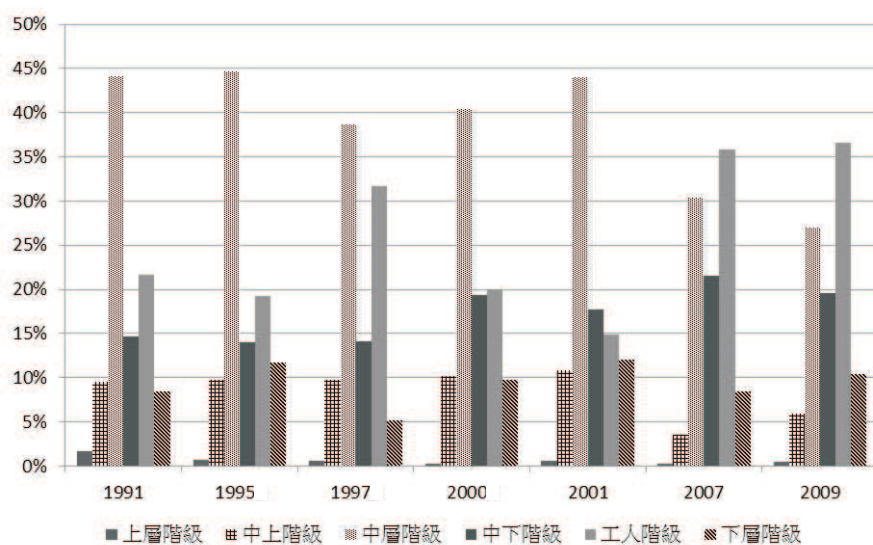


圖 8 臺灣民衆主觀階級向下流動 (自認為中下階級與工人階級增加), 1991-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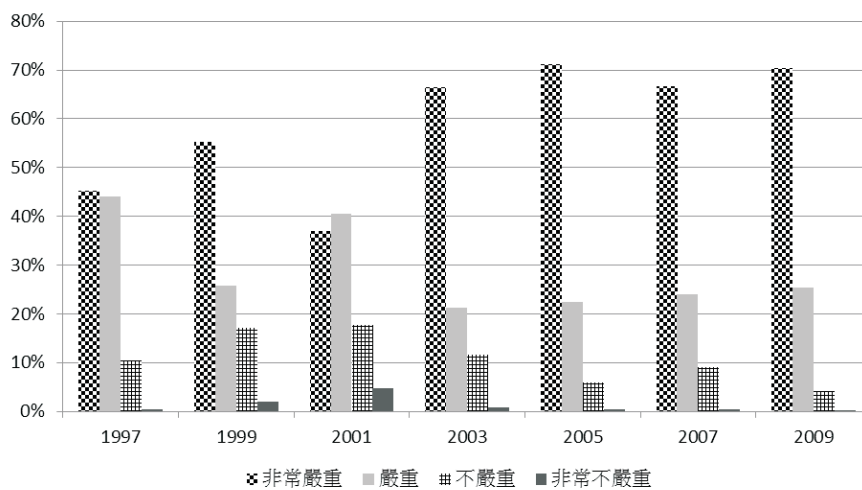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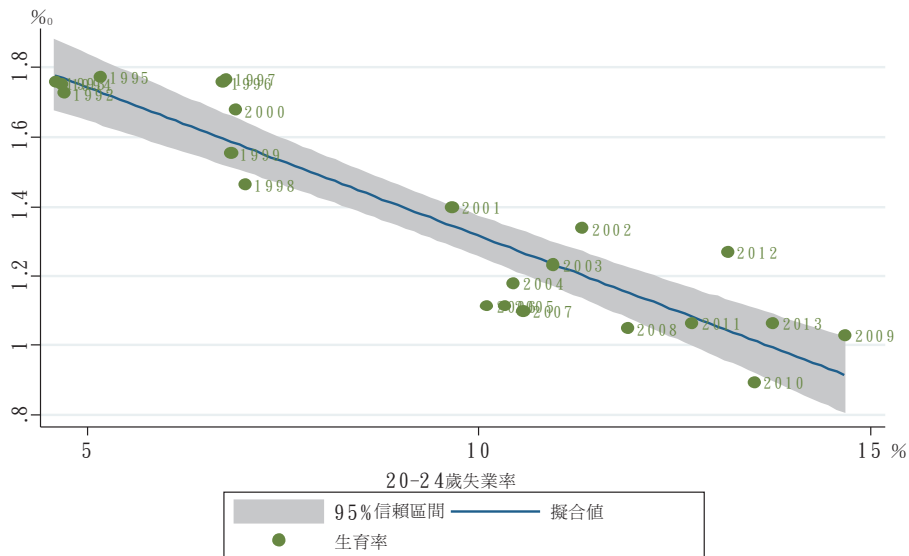


圖 9 臺灣民衆對貧富差距嚴重程度的主觀感受, 1997-2009

嚴重者飆高到 66%，在 2005 年與 2009 年更兩度超越七成，認為貧富差距不嚴重者降低到一成以下，此外，筆者研究還發現臺灣民衆，尤其是中下階級對



註：生育率為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係指一個假設世代的育齡婦女按照目前的年齡別生育水準，在無死亡的情況下，渡過其生育年齡期間以後，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或生育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人口資料庫－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行政院主計總處。

圖 10 臺灣民眾 20-24 歲之失業率上升與總合生育率的下降, 1992-2013

「努力就能成功」這種功績主義信仰下滑，感覺「自己越來越追不上有錢人」的相對剝奪感上升，甚至連「最近快不快樂」與生活滿意程度都大幅下滑（林宗弘，2013）。

除了主觀的階級向下流動與相對剝奪感之外，與歐洲國家研究的發現類似，臺灣年輕世代面對失業、工作不穩定與低薪等經濟條件時，會推遲婚育年齡甚至減少生育，這或許也跟房地產泡沫導致年輕世代難以買房成家有關（朱敬一與康廷嶽，2015）。圖 10 顯示臺灣民眾 20-24 歲之失業率上升、與總合生育率的下降有非常顯著的相關；不僅如此，在貧窮率上升之際自殺率也顯著上升，主要是壯年與老年失業、貧困與疾病同時造成貧富差距與自殺率的惡化。上述資料顯示，臺灣貧富差距惡化的影響，不僅及於民眾的心理鬱卒與政治不滿，甚至擴散到其他的社會問題，例如少子女化、壯年與老年人口自殺率升高、吸毒與財務詐騙類的犯罪率提升、家庭暴力增加等層面（林宗弘等，2011）。



## 5. 結論

階級是影響貧富差距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旨在回顧近二十年來，臺灣階級不平等與階級流動的發展趨勢，從而解釋目前的政治事件與社會氛圍。近幾年來，筆者與少數社會階層學者的研究顯示，造成臺灣階級不平等惡化的因素有二，其一是產業升級造成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之間薪資所得不平等上升，但這並非最不公平的部分；其二是全球化之下兩岸經貿往來擴張，獲益者集中在少數資方與技術管理高層，甚至可能減少本土中下階級就業機會與薪資所得，而對財產所有者減稅，更導致上述階級之間的所得分配不平等惡化。

各個階級之間所得分配不平等惡化的後果包括階級流動停滯、並且改變民衆主觀的心理狀態，擴散到多種社會問題。本文回顧了有關創業機會減少與教育階級複製的研究，認為由於產業外移與資本集中化，臺灣中下階級民衆透過創業達成階級流動的機會明顯減少，而中下階級家庭子女的教育流動機會並沒有改善，中下階級家庭子女大量進入由專科升格而來、學費較高的私立大學院校，其薪資卻與專科畢業者相差無幾。因此，多項指標顯示臺灣民衆主觀上開始覺得自己的階級地位向下流動、而且覺得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

從這些研究成果來看，臺灣民衆對產業轉型與全球化造成的階級不平等惡化有所焦慮與不滿，或多或少影響了 2014 年底的選舉結果。然而，這不僅是臺灣當前政府或個別政策的問題，而是過去三十年間，先進經濟體共同面對全球化之下貧富分化衝擊所造成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國際上許多類似的反自由貿易或反全球化社會運動可資佐證。筆者雖然不反對有條件與有策略的自由貿易，但全球化所導致的階級分化等後遺症，顯然需要政府大力干預，Piketty (2014) 對二十一世紀歐美先進國家財富分配的研究，以及其關於全球資本利得稅的政策主張，正反映當前全球各地與臺灣公衆的焦慮與社會科學社群的學術關懷。

## 參考文獻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1),《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第六期第一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 臺北: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王振寰 (2010),《追趕的極限: 臺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 臺北: 巨流出版社。
- 朱敬一與康廷嶽 (2015),「經濟轉型中的「社會不公平」」,《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45(2), 1-22。
- 林宗弘 (2009),「臺灣的後工業化: 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 1992-2007」,《臺灣社會學刊》, 43, 93-158。
- 林宗弘 (2012),「ECFA 之後的中國效應: 兩岸貿易對臺灣貧富差距與階級政治的影響」, 楊文山與尹寶珊 (主編),《面對挑戰: 臺灣與香港之比較》, 287-325, 臺北: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林宗弘 (2013),「失落的年代: 臺灣民衆階級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變遷」,《人文與社會研究集刊》, 25(4), 689-734。
- 林宗弘 (2014),「進擊的巨人: 臺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果」, 臺灣社會學會 2014 年度研討會, 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與臺灣社會學會。
- 林宗弘, 洪敬舒, 李健鴻, 王兆慶與張烽益 (2011),《崩世代: 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臺北: 臺灣勞工陣線。
- 林宗弘與胡克威 (2011),「愛恨 ECFA: 兩岸貿易與臺灣的階級政治」,《思與言》, 49(3), 95-134。
- 張宜君與林宗弘 (2013),「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不平等: 以臺灣高等教育改革為例」, 臺灣社會學會 2013 年度研討會, 臺北: 政治大學與臺灣社會學會。
- 張茂桂 (2011),「倡議中國效應研究的觀點」,《臺灣社會學會通訊》, 72, 25-30。
- 駱明慶 (2002),「誰是臺大學生? 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 30(1), 113-147。
- 謝國雄 (1989),「黑手變頭家: 臺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2(2), 11-54。
- 蘇國賢 (2008),「臺灣的所得分配與社會流動之長期趨勢」, 王宏仁、李廣均與龔宜君 (主編),《跨戒: 流動與堅持的臺灣社會》, 187-216, 臺北: 群學出版社。

- 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05),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tkinson, A. B. (2008),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in OECD Count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bb, S. (2005),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Recent Evidence and Current Deb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 199–222.
- Crompton, R. (1998),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urrent Debat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rikson, R. and J.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eber, D. R. (2013), *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 New York: Spiegel & Grau.
- Grusky, D. B. and G. Galescu (2005), “Foundations of a Neo-Durkheimian Class Analysis,” in E. O.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51–81,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ber, E. and J. D. Stephens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arties and Policies in Global Markets*,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ckman, M. R. and R. W. Jackman (1983), *Class Awar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elley, J. and M. D. R. Evans (1995),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Six Western N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2), 157–178.
- Lareau, A. and D. Conley (2008), *Social Class: How Does It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in, T.-H. (2015), “Cross-Strait Trade and Class Cleavages in Taiwan,” in S. Gunter and M.-K. Chang, (eds), *Assessing China Impact*, forthcoming, London: Routledge.
- Milanovic, B. (2005), *Worlds Apart: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Inequ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alan, R., R. Murphy, and C. Chavagneux (2010), *Tax Havens: How Globalization Really Work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vit, Y. and H. Blossfeld (1993),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Silver, B. J.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rensen, A. B. (2000), "Toward a Sounder Basis for Class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6), 1523–1558.
- Wood, A. (1994),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E. O.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E. O. (2005), "Foundations of a Neo-Marxist Class Analysis," in E. O.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4–30,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 (林宗弘)

##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REASING CLASS INEQUALITY IN TAIWAN

**Thung Hong L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Keywords:** Class, Social inequality, Social mobility, Class consciousness,  
Taiwan

**JEL Classification:** I30

---

\* Correspondence: Thung Hong L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15, Taiwan. Tel: (02) 2652-5107; Fax: (02) 2652-5050; E-mail: zoo42@gate.sinica.edu.tw.



##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recent findings of class analysis in Taiwan. The studies find that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social classes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and point out two sources of the inequality: (1) industrial upgrading led to increasing wage inequality between skilled workers and unskilled workers; (2) the cross-strait open trade policy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context led to in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employers plus some top managers who went to China for investment, and the local employees plus self-employed in Taiwan. The increasing class inequality also results in declining class mobility, shrinking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rising political discontent among middle- and lower- class people. The increasing class inequality may partially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the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in Taiwan.*